

国

# 唐代明道文学观 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

符懋濂 著 |

# 唐宋明道文学观 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

符懋濂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符懋濂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符懋濂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610-5657-8

I. 唐… II. 符…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767 号

责任编辑：武瑛  
封面设计：蓝狮书装

版式设计：蓝狮书装  
责任校对：李佳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网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mailto:lnupress@vip.163.com)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

幅面尺寸：880mm×1230mm 印张：11.75  
字数：280 千字

---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30.00 元  
书号：ISBN 978-7-5610-5657-8

## 序 文

符懋濂先生的著作《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即将出版了。这部著作原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该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当然感到十分高兴。

符先生是新加坡华裔学者。初次相见的时候，我已经过了耳顺之年。当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精干而朴实。当得知他的年龄比我还大，已经退休多年，并且还在“发挥余热”，从事着社会教育工作的时候，不禁感到惊讶和佩服。接着又得知，他原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早已取得了硕士学位，只因后来新加坡教育制度发生变化，所以未能继续攻读博士课程。如今就是为了圆这个继续学习博士课程的梦而来到复旦的。他的深造，完全是出于兴趣，为了求知，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我还是第一次指导这样年龄和经历的学生。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们经常交换意见。符先生原来的专业是历史学，而我感到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也有相当的了解。文史不分家，本该如此。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据符先生说，他在新加坡读中学时，对于许多中国古代诗文名篇都是按要求背诵、精读的，因此获益匪浅。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们二人在一些问题上当然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是直来直去，学术上有不同想法就要说，尽管符先生年长于我，经历比我丰富；而符先生呢，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有时候所谓“指导”便成了二人之间的学术研讨。我觉得符先生的这种坦诚，这种坚持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精神，非常可贵。教学相长，在相互讨论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好处。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至今还记得当时讨论甚至是争论的情景，并且十分怀念。

在《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中，确实可以看到不少经过深思熟虑，有着亲切体会的见解。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正统历史观，其核心内容乃是大一统的理论。论文说：“从元代开始，凡是能够统治全中国，实现政治大一统的王朝，不论来自哪个民族，都被视为正统王朝，如元王朝、清王朝。这就是王朝正统性的真正内涵，虽然王夫之、梁启超等人并不接受此一界说。”王夫之、梁启超在思想史、史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当然崇高，但符先生并不盲从他们的观点。论文又强调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理念的重要。秦汉统一以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有过不止一次的分裂时期，但“大一统”的理念始终存在，终究转化为政治、民族的统一。与欧洲历史比较起来，统一是一个鲜明的特点。论文说，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帝国，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一旦分裂，就再也无法统一。中国则不然。其间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地理、历史、经济诸种背景上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大一统”理念的确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论文热情地指出：“两千余年来，大一统观念不仅早已演化为文化基因，渗入中华传统文化实体之内，而且历久弥新，魅力无穷，就连今日的海外华人也深受其惠。”作者举例说，对于台湾分离主义者“去中国化”的倒行逆施，华人中凡接受中文教育者多深恶痛绝，这就是因为他们“蒙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血液中含有政治大一统的遗传因子”。符先生说，此点或许国内文史学者关注还不够，故在论文中特为指出。

从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理念之重要，论文肯定了汉代独尊儒术的积极方面：“从汉武帝开始，思想大一统与政治大一统结合为一，相互作用，构成正统历史观两股精神或道德力量，支撑着

历代中华帝国的重建与发展。……从历史主义角度来看，我们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既不可否定，也不可忽视。单就这点而言，董仲舒不愧为独具慧眼的思想家，而汉武帝不失为非凡的帝王”。而儒家思想既取得了权威的地位，又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它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世俗性的思想。因此，“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趋向于多元性”，“从根本上排除了一元论信仰的极端化，消除了宗教战争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而且“历代统治者还可充分利用儒家思想的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之有利于政治大一统的重建与维系”。

论文还强调了汉字与大一统的关系：“汉字是大一统理念的产物，而汉字的独特性，使其政治功能超越拉丁或任何一种表音文字”，对于重建、维系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功不可没。

从上面简略的介绍，不难看出，符先生的治学，确确实实是深思熟虑，决不随声附和。而且从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位海外华裔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的拳拳之心。

今年春夏之交，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严峻的考验。3月14日拉萨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西方某些媒体乘机造谣诬蔑，激起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极大义愤。中华民族子孙的血液毕竟有着共同的遗传基因。符先生多次给我来信，义形于言，令人十分感动。嗣后又是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全球为之震撼。符先生同样极大地关注着，和我们一起悲痛欲绝，一起为灾难中焕发的人性光辉而深深感动。他坚信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幸有成城众志，不惧万险千难”，“十三亿神州，多英杰”，“齐心绘就、江山似画，谁能越”。他在所作诗词中这样坚定、热情地歌唱。读了符先生的信，我更加感到他的论文中许多观点真是出自内心深切的体会。

借着论文出版之机，回顾数年前读论文时的感受，回顾和符先生的交往，当日情景又回到眼前，颇感愉快，也不禁觉得有点儿留恋。拉拉杂杂写下一些，权为序言。

杨 明

2008年7月于上海浦东

## 语录二则

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示历史的全貌、线索。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里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在综合时，又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高瞻远瞩，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360页）

## 致 谢

论文的出版，得到各方的支持与协助，不胜铭感于心。

首先，恩师杨明教授拨冗撰赐序文，诸多美言，令本书生色不少，谨此再致以万分谢忱。

其次，诸多好友协助联系出版社，其中严春宝博士及其兄长严春友教授一次就接洽了多家，供我选择，同样令我感激不尽。

最后，还得感谢辽宁大学出版社，尤其是武瑛女士及其编辑部同事，在编辑与出版过程中，所体现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与专业精神。

符懋濂

2008年8月31日

## 论文摘要

所谓文史观，就是人们对文史本质、范畴与功能的基本认知，并且由此衍生的文史观点与观念。在唐人基本文学观中，文学与文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范畴：文章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则涵盖文章与学问，并且以学问为内容、为核心；没有内容（言之无物）的文章，就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文章既是学问的载体，也是文学的形式或体裁，属于文学的组成部分。文章（多简称文）的范畴甚广，凡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足以表情达意的作品，不论其体裁、性质、功能如何，皆可包含在内。

在唐人基本历史观里，不仅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已有相当充分的认知，而且也能正确区分“主体化历史”中的史书与史学。修史理论或史学批评的出现，说明了唐人的基本历史观已相当进步，对于历史主体化的认识（即主体化的原理、原则）已达到较高水平。唐人认为史纂和实录虽然很重要，但只能存真，即保存史料；要使史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还得讲究编撰方法、技巧，还得依靠史论（即论赞）的阐释、论述。

透过历代对文史本质、文史范畴与文史功能认知的比较研究，可知唐代基本文史观的历史定位：承前启后，一脉相传，其延续性与稳定性显而易见。在新文学、新史学诞生之前，中国人的基本文史观只有渐变、量变，没有突变、质变。任何事物形成、变化，一般是内因与外因互动、激化之结果。唐代文史观的延续性与稳

定性形成的因素，同样包含内因与外因两部分。前者指文史观本身“三位一体”的内部结构，后者指文史观所依存之社会基础。

对唐人而言，文学不仅具有审美愉悦价值，而且包含教育、认知与借鉴等多重社会功能。为达到功能多元化之目的，其表现手法或方式既有形象的、感性的，也有抽象的、理性的，甚且以后者为主。历史范畴与文学范畴虽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基本功能却大同小异：认知功能、政治功能、借鉴功能都是文史作品所应共同具备的，而审美功能、愉悦功能也不让文学作品专美。文史基本功能几乎完全重叠的文化特质，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而构建了十分相似的文化基因图谱，而“文史合一”就是这两个文化基因图谱的产物。

和儒家哲学一样，属于儒家文学观的“文以明道说”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与高度的兼容性（后者尤其重要）。它是诗教说的延续、扩大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儒家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明道说和长期盛行的言志说、文气说、缘情说，无论在文学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都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它们并行不悖，相互为用，甚至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内容。

明道文学观涵盖了诗歌、散文两个领域。在诗歌领域里，它继承了《诗经》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并不排斥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白居易诗论可作为代表。唐诗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明道文学观并不局限于唐代诗歌的创作倾向、理论发展空间。就个别诗人来看，它既不妨碍诗人的“个性自由”，也不削弱诗人的“自我意识”。

在散文领域里，它同样以儒家思想为哲学基础，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朴实无华，注重经世致用，所以论说、理性之文（以奏疏、书论为主）始终居于最主要地位。散文作品的题旨，除了反映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是宣扬儒家的政治理念，从轻徭薄赋、保

民养民到王道仁政、非战反战，其积极进取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鉴于儒家思想的兼容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明道文学观对唐代散文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它并不妨碍散文作品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向。

唐代明道文学观是正统的，而正统历史观则是明道的。前者之所以是正统的，是由于它具有显明的主流性、权威性与传承性；后者之所以是明道的，是因为它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或理性主义精神，也属于儒家思想。经世致用在文学领域所释放的深度的人文关怀，其实就是古典现实主义。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正统历史观有时、空两个范畴：传承性属于时间范畴，它决定了这种价值取向在时间上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即由古至今，世代相传，基本上从未间断。主流性则属于空间范畴，它决定了正统历史观在空间上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即在全国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接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有了以上的定义或界说，就可以了解唐代正统历史观的真正内涵，除了“王朝正统性”、“政治大一统”外，还应包括“疏通知远”、“以史为鉴”两个层面，因为这些价值观念均具有主导性、传承性和实用性，都属于传统历史观念中的主流意识。四大文化元素缺一不可，其中仍以政治大一统为其主体、为其基石，因为它属于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目标范畴。任何手段都从属于目标，并为目标服务，无一例外，王朝正统性、疏通知远、以史为鉴亦然。

无论是诗教说，还是明道说，其核心价值均为经世致用或实用主义，即将文学作为“修齐治平”的文化软件；而正统历史观内涵中的政治大一统、王朝正统性、疏通知远、以史为鉴，则可归纳为“经世致用”四字，同样是将历史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软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经世致用”便成为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也是维系两者文化共性的坚韧纽带。

从隋唐到清代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中华帝国虽曾一再发生分裂，但最终又重归于统一。这种“分久又合”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原因不止一端，而且相当复杂，但是归根结底，作为正统历史观核心的大一统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大一统思想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集中体现，并且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中央集权、科举制度乃至汉字系统，都是其政治产物。

政治大一统的构建与维系均需要中央集权体制。在君主专制时代里，皇权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核心，皇权强弱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成败。因此，维护皇权就成为唐代历史家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所谓“维护皇权”，在此有两层含义：一是支持郡县制，反对封建制（分封制），因为后者必然在客观上最终削弱皇权，不利于中央集权体制。二是借助史书或奏议，不断提醒最高统治者要成为贤君，要施行仁政，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滥用权力。

唐人对边塞战争、华夷关系与藩镇割据的理性认知，是构建唐代政治大一统思想的三个层面。从唐代文史家的诗文里，不难发掘在每一个层面里，都存在着政治大一统思想。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大一统思想在唐代已普遍存在，并已渗入唐代文史家的灵魂深处，所以构成正统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和最重要的中华文化遗产之一。唐代文学家主张“文以明道”中的“道”，既然也包含“政治大一统之道”在内，所以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在大一统思想里再度交会，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大一统思想不仅是唐人正统历史观的核心内涵，同时也是明道文学观的主要内涵之一，所以它自然成为两者的共同文化基因。

到了唐代，作为正统历史观重要内涵的“以史为鉴”，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政治哲学，即治国平

天下的行动指南。因其传统性与正统性，在唐代的谏议制度之下，甚至转化为足以制约皇权的思想武器或道义力量。例如，吴兢的《贞观政要》不仅在理论上提倡“以史为鉴”，而且请求唐玄宗付诸实践，效仿贞观之治业；也就是试图将“以史为鉴”落到实处，将这一抽象理念具体化、政治化，发挥其实用功能。

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文学必须和历史结合为一体，优先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包括教育功能、借鉴功能在内），而后才轮到个人的审美娱乐情趣。文史的共生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共同基石之上的！唐代文史家站在同一战线，同声批判南朝文学——尤其是“宫体”，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审美意识。他们嘲讽南朝文学中的“亡国之音”，即依据儒家的“诗可以观”这一文化传统。

历史家刘知几相信史以文传，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他鄙视、排斥华而不实的诗文，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他非议作品堆砌词藻，滥用典故，但并不忽视语言文辞之美；他在语言运用上要求区分文史，但在社会功能上，又主张文史合而为一。可见刘知几的文学观是个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绝非“政治工具说”所能概括。魏征等其他历史家的文学观中也不尽是微言大义，或者说在微言大义之外，还有完全属于作家个人生活的审美情趣。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佛、道两教属于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势力，宦官与藩镇属于削弱皇权的分裂主义势力，而四六文则属于阻碍儒学复兴的保守势力。自始至终，韩愈借助“历史”的权威与政治功能，排斥佛老，推崇儒学；反对宦官专政与藩镇割据，拥护中央集权体制；摈弃四六文，倡导古文运动。其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即全力维护唐帝国的政治大一统，而这一政治理念来自韩愈的历史观。

柳宗元的历史观蕴含两大核心内容：除了反对藩镇割据，拥

护中央集权，就是否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与皇权天授说，提倡人本主义，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反对皇权天授之说，不等于主张限制或削弱皇权，所以它和拥护中央集权体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柳宗元和董仲舒虽在哲学本体论上，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在历史哲学或历史观上，又存在着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矛盾，但对于维护中华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两人的见解却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史合一观念的指引下，唐修正史列传的文学色彩相当鲜明、强烈；而从文学在唐代史书中的位置，又可知“史中有文”这一文化基因，历久弥新，世代相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它在保存与丰富古典文学遗产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古典小说（从传奇小说到章回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史合一的文化传统在唐代得以延续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的明道文学观和正统历史观含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即由儒家思想所释放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与借鉴功能。文中有史，史以文传，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特征。历史在唐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位置，既反映了文学家深厚的历史情结，亦深化、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史学与新文学既然同步形成，人们不但对文史本质有了全新的界说，而且对文史范畴、功能的认知，也发生了质变。但因古今文史观的歧异，也出现新旧文史脱轨或脱节的文化现象。因此，在分别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今文史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同时，也应逐步推行旧文学与新文学、旧史学与新史学之全面接轨，以促进中国新文学与新史学的发展。

**关键词：**唐代文学 唐代史学 文学观 历史观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I209

## A Brief of Contents

The thesis entitl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of China* is structured into eight chapters, apart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spells out the motiv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as well as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used as a general guideline by the author.

The first two Chapters re-examine closely the definitions, categor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from H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actual definition or concept of Wenxue 文学 ( or literature in English ) in the Tang Dynasty ( 618—907 ) wa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ur time since it was regarded as a combination of two Chinese characters Wen 文 ( prose or poetry ) and Xue 学 ( knowledge or contents ), meaning prose and poetry with knowledge or contents. There was no change of mindset in terms of the three specific features ( of definitions, categories and functions ) of mentioned above mainly due to the trinity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continuity of the social economic basis. To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s, Lishi 历史 ( or History in English ) was not merely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since it was

distinguishable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y ( historical facts ) and Subjective History ( history in writing ). For Subjective History,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y were required throughout the whole written process, an idea from the famous historian Liu Zhiji 刘知几 ( 661—721 ).

Chapter Three and Chapter Four, cover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two concepts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 are the most vital ones.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 The real meaning and content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are widely misunderstood by the modern Chinese scholars.Being part of the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the prominent perception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ere the general guideline for all sorts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 writings in Tang Dynasty.

2 ) Although the categories of literature differ from that of history and yet both shared almost the same values, including their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 This is common phenomenon not only reproduced two similar cultural genes, but also mad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 two-in-one in terms of conception.

3 )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the political position as imperial officials we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ancient scholars to put more efforts into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4 ) The concepts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China, also part of the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was so strong that it enabled re-un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centre of the world, even afte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of separation.

Chapters Five and Six point out that a large volume of high quality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